

# 智能手机使用中彝族青年集体记忆的危机及对策研究

江凌, 陈玉婷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通过对10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中有关四川凉山彝族群体的报道文本分析,结合对凉山彝族青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主流媒体报道下的彝族群体形象与该群体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差异,而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生产着媒介记忆,发挥着重要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赋予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和身体操演的全新方式,使得他们在原有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新记忆,同时也遭遇着族群记忆离散、数字化遗忘和过度娱乐化等危机。由此提出生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作品,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路径,回归文化自信、重塑传统价值等建议,让彝族青年主动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缔造者,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繁荣。

**关键词:**媒介记忆;集体记忆;彝族青年;智能手机

**中图分类号:**G206;D66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4-0019-05

## Study on the Crisis over Yi Ethnic Young People's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ir Smart Phone Us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JIANG Ling, CHEN Yuti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Art Desig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es of reports about Yi ethnic people in Liangshan, Sichuan Province from 10 mainstream media on Weibo, and on empirical studies on Yi ethnic young people's use of smart phone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image of Yi people presented by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image self-painted by Yi ethnic young people on social media could be found. New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ndering such differences through generation of media memories. Smartphones have endowed Yi ethnic young people with new ways of culture practice, so that they could create new memories with more vitality on the basis of their original collective memory. Nevertheless, new media memories also cause crises such as ethnic memory fragmentation, digital amnesia and excessive entertainm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suggested: Yi ethnic young people should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external resources, mobilize and revise their narratives, and reshape their collective memo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ir ethnic culture.

**Keywords:**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Yi ethnic young people; smart phone

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最早将集体记忆理论作为一套完备的理论系统化的学者,他在著作《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书中开创性地定义了集体记忆:某个群体中的个体“共享事件的过程和结果”<sup>[1]</sup>。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认为,集体记忆是通过仪式化操演被传播和保持的。他将两个特殊社会活动领域的方式——“纪念仪式”和“身体习惯”分别加以评论,辨析了纪念仪式本质上是一种再现现实性的操演话语,本质上是身体的实践,而身

体实践又可被分为是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sup>[2]</sup>。

国内的传播学视野中,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媒体对于社会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作用 and 探索价值。当下的媒介记忆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聚焦媒体记忆,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探索主流媒体如何塑造集体记忆(李红涛,黄顺铭,2015);另一种关注公共记忆场域中的个体记忆,探索新传播环境下,把握了更多权力的受众与自媒体怎样主导并消费集体记忆。

**收稿日期:**2020-0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青年项目:智能手机对彝族青年生活方式及其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凉山彝寨的实证考察(18CXW013)。

**作者简介:**江凌(1985—),女,四川雷波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新媒体传播。

在对彝族青年进行的个案研究中,通过考察主流媒体文本与自媒体内容,可以发现受众自身而非传统媒体建构了他们所认同的集体记忆。因此,本研究以第二种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路径,发现彝族青年在生产与消费媒体记忆的过程中面临的若干危机与问题。如何更好地应对与切实解决这些危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发现

本课题组于2019年6月对凉山境内的昭觉中学、凉山州民族中学、喜德县中学、川兴中学、冕宁县中学、金阳中学等七所中学的彝族高中生群体投放了450份“凉山彝族青年智能手机使用及影响”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84份,其中年龄在15~17岁的受访者占51.56%;18~20岁的占45.31%。数据显示:88.8%的彝族青年是智能手机使用者,27.86%的彝族青年每天使用手机时长1~2小时,24.74%的彝族青年每天使用手机时长在1小时以内,21.88%的彝族青年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2~3小时,不难看出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普遍地嵌入了当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课题组在对四川凉山“悬崖村”彝族青年手机直播及短视频的田野调查中还发现,彝族青年群体通过手机新媒体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实践:通过多元立体的符号化、场景化、风格化展演,手机直播与短视频提供了唤醒民族集体记忆的情景框架,视频处理技术的低门槛推动了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双重勾连<sup>[3]</sup>。

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些新传播形式提供的情景框架与传统媒体有何不同,本研究以新华网、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澎湃新闻、Vista看天下和搜狐新闻等10家媒体账号作为对象,以“彝族”为关键词,在新浪微博进行搜索,整理自2011年来有关四川凉山彝族原创微博,得到结果如图1~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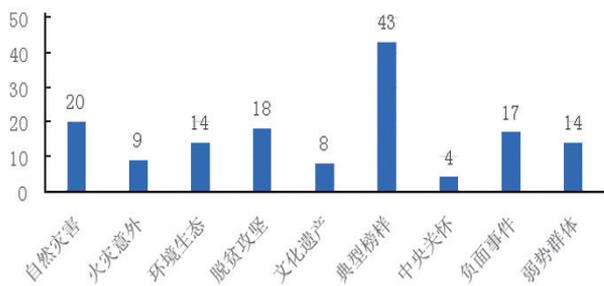


图1 2011—2020年十家主流媒体对大凉山彝族的微博报道内容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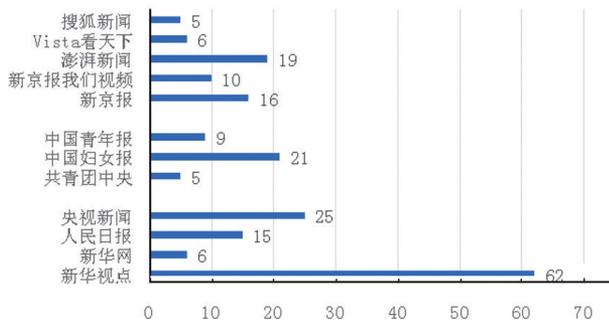


图2 2011—2020年十家媒体对大凉山彝族的微博报道

“官方对红色议题进行的大量宣传活动和典型人物推广是种被仪式化了的政治动员过程,承担着议题目标推进和政治理念教化的重要作用”<sup>[4]</sup>。研究发现,典型榜样和脱贫攻坚题材是报道的主旋律。主流媒体对彝族的报道是一种刻写实践,通过建立中央领导与彝族人民物质生活、思想水平提高间的必然关系,将政治话语编织进入彝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集体记忆之中,突出执政党当政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在手机直播和短视频的传播形式中,彝族青年对民族记忆的集体唤醒鲜见政治表达和严肃议题,而是集中在对彝族民俗文化符号的视听展示上,体现在对主播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表演里,反映在对理想生活方式的定义诠释中,更多地表达了一种被想象拔高的“理想自我”,这是一种日常生活被媒介化后,互动体验和自我期待共同促成的日常呈现行动<sup>[5]</sup>。

亚历安德罗·拜尔(Alejandro Baer)提出,互联网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且这些书写的内容是相互竞争的<sup>[6]</sup>。彝族青年正在通过智能手机创造基于原有集体记忆的新记忆。相较传统大众媒体,这些媒介记忆更为丰富鲜活、更能反映他们的当代生活,也加速了他们的文化实践。

但是,社交网络中一夜成名的网红神话诱惑着彝族青年,使他们的表演呈现出急于突围和宣泄的内容风格。手机依赖、手机传播的负面内容和泛娱乐化倾向也使得彝族青少年间的民族记忆传承产生了危机。通过调查问卷和文本分析,本研究旨在让凉山彝族青年记忆传承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找到解决危机的可行方法。

## 二、危机表现:离散、遗忘与祛魅

彝族青年的记忆传承危机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文化传承断裂导致的族群记忆离散、

技术更新导致的数字化遗忘和缺乏价值观教育导致的过度娱乐化,我们将分别考察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潜在原因。

### 1. 族群记忆离散

彝族传统文化符号在传承中经历了多种记忆载体的变迁,在商品经济化和现代城市化的冲击下呈现出“流散化”的趋势<sup>[6]</sup>。彝族传统文化主要包括语言、宗教、节日、婚丧和地方性知识<sup>[7]</sup>,在通过互联网和外部世界发生的互动、冲突以及交流中,这些文化符号蕴含的意义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丧失。

#### (1) 书面语言

问卷显示:凉山彝族青年中的受访者彝语读、写能力低于听、说能力(图3),88.28%的受访者并未在手机中安装彝语输入法,38.02%的受访者相较彝语更愿意接受汉语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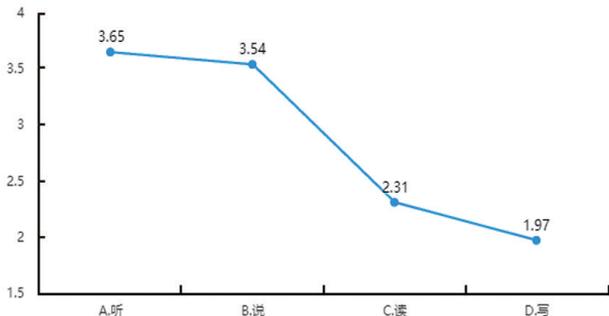


图3 凉山彝族受访青年彝语掌握程度情况总体评分

彝族青年在新媒体中通过仪式化的线上交往协作书写集体记忆文本,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却较少使用彝语,彝语本身的传承危机或许能解释这一现象。“彝族青少年的彝语词汇量正在缩减,表达单一、笼统,对近义词的区别性特征认识模糊,在语言接触所带来的语言竞争中,大量汉语词汇的借用使彝语词汇遭到排挤,影响了彝语表达的精密性和词汇的系统性”<sup>[8]</sup>。此外,使用彝语手机输入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下载专用输入法、输入插件外,还需要导入少数民族语料库并完成系统设置的修改,如此繁复困难的操作让年轻人望而生畏。

#### (2) 民俗仪式

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认为,集体记忆的传承是一种需要借助身体来完成的行为。纪念仪式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它们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时间来使人纪念过去。身体的姿势、衣着与象征物是一种非语言的编码,在文化仪式中,这些编码组合成了可以被解读的文本,能够解读这一文本的每一个人就成了共享意义的集体<sup>[9]</sup>。在彝族青年

进行民间仪式的身体实践中,他们通过祭拜、演出、舞蹈和穿戴民族服饰等编码行为重演本民族英雄祖先的历史故事,解释着民族的习俗来源和文化内涵,呼唤着来自远古的集体记忆。

文化仪式的流散化趋势相较语言稍显乐观,大多数彝族青年仍对彝族风俗习惯比较了解(51.56%),仅有3.13%的调查对象不太了解。同时,彝族青年对本民族的文化仪式充满了热忱和情感。数据显示,在举行本民族节日或传统文化活动时,83.85%的受访者会用手机进行记录,82.03%的受访者会使用智能手机主动上传或分享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这主要是“确保集体意识之持续性”的文化仪式本身没有消亡,反而在民间、官方和消费社会的共谋中日益昌盛的缘故。如在对彝族花鼓舞的考察中,有学者提出:政府、专家、文化产品生产者、商人和民族主体都将民族歌舞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进行利用、扶持和改造<sup>[9]</sup>。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花鼓舞全面受到外来权力干预,得以顺利进入当地学校开始制度化传习和展演<sup>[10]</sup>。然而,尽管对彝族文化的改造保障了它的延续,但这些记忆中也存在着形式单一模式化、内容重复单调以及假叙事所造成的文化内涵抽空、文化品质消解和文化认同偏差等问题<sup>[11]</sup>。

#### (3) 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是某一地域性文化或地方社会特有的知识。它的流散化趋势体现在彝族青年对媒介内容的消费取向上:他们最钟爱的文化产品并非和自己族群密切相关。只有21.35%的受访者认为手机的使用提升了他们对彝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39.84%的受访者很少使用手机搜索或下载有关于彝族的音乐与视频。在“喜爱的媒介内容类型评分”中,彝族题材的各类作品大多得分平平:短视频排名第5;网络电影和电视剧排名第7;网络文学排名第9;网络动漫排名第10。相比之下,校园、科幻、搞笑、动作等热门题材更受青睐。

与对彝族历史题材的兴趣稀缺产生强烈对比的,是他们对外部世界展露出的强烈向往:70.31%的彝族青年认为手机使用“提升了我对社会和世界的了解和认识”,65.1%希望将来离开家乡去外部社会发展,只有6.51%坚定地表达了留在家乡的意愿。

这是媒介内容间商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其他学者在对白彝民歌传承情况的调查中发现,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流出打工和留守老人的一知半解导致口口相传的历史传说和民歌艺术难以维系,落后的物质条件取消了精神文化的追求,也带来了族内人

的民族自卑感<sup>[12]</sup>。淳朴原始、体系凋零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年轻人心目中敌不过花哨精致、展示都市繁华的娱乐工业产品,听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 2. 数字化遗忘

范迪克(Van Dijck)认为,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回忆的塑造,数字化和多媒体化将重新定义长期以来被保存在大脑和模拟介质中的记忆<sup>[13]</sup>。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智能手机的使用重塑了彝族青年塑造记忆和回忆过去的方式,使得严肃的历史知识与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失去原先的深度与广度<sup>[14]</sup>。

问卷显示:作为互动交流与娱乐休闲方式,手机应用已经成为彝族青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84.64%的受访者喜欢QQ、微信等联络通信应用,72.92%的受访者钟爱QQ音乐、网易云音乐等音乐应用,48.18%的受访者青睐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

但这些应用中广泛存在信息即时化、庸俗化和碎片化的问题,它们也倾向于鼓励自己的使用者习惯性接受并主动传播此类信息。46.61%的受访者一天更新微信朋友圈一次以上,46.09%的受访者一天更新QQ动态一次以上。

迅速和易得的信息获取习惯不仅导致了信息本身的失真与俗化,也拒斥了受众再度回归深度内容的可能。以短视频内容消费为例,有83.58%的受访者在平时收看短视频,并且在视频时长选择中存在着一种“越短越好”的倾向:34.11%的受访者倾向于时长在1分钟以内的短视频,19.27%的倾向于15秒以内,23.18%倾向于1~3分钟的短视频内容,只有16.41%的受访者能够接受3分钟以上的短视频。

尽管超过九成的中小学生知晓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存在,但对其进行了系统全面了解的学生寥寥无几,并且他们原本浓厚的兴趣随着年级的递增呈递减趋势<sup>[15]</sup>。通过图文并茂的文章介绍和短视频解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确实可以被彝族青年所获得。但在一个排斥线性逻辑理性参与的非线性无序网络中,让受众保持耐心读完长达十三章的彝语五言句长诗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 3. 过度娱乐化

“互联网对集体记忆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集体记忆的价值祛魅,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时代,怀疑、狂欢、戏谑以及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加剧了公共仪式的形式化、空洞化、虚无化,使集体记忆失去了重要的凭借和载体<sup>[16]</sup>”。

沉迷虚无化、抽离思考且难以自拔的廉价娱乐在彝族青年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64.84%的彝族青年认为手机的使用提供了更多的娱乐休闲方式,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手机使用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其中77.08%认为“玩手机成为习惯,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我很多时间”,48.44%认为手机造成“常常熬夜,作息混乱”,40.1%认为“依赖网上信息,独立思考能力下降”,但仍有78.91%的受访者出现了手机依赖情况。问卷显示在内容偏好方面,受访者对幽默搞笑和喜剧类内容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尤其是以搞笑为特征的短视频、网络电影、电视剧和网络动漫。

造成这种偏好的原因,一部分或许是娱乐类的内容本身理解门槛较低、浅显易懂且数量泛滥,对于客观上存在一定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的彝族青年而言更为友好;另一部分归功于平台的分发机制。相较微博、知乎等网络社区,即时通信和短视频平台更为注重去中心化的运营方式,从各个环节为草根用户跨越社会圈层的展示提供助力<sup>[17]</sup>。而为了实现源源不断的“草根网红”生产,容易制作的娱乐类内容必然成为平台主要推荐的信息。

## 三、对策思考:生产、变革与重塑

为了缓解上述危机,保障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繁荣,新时代的彝族青年需要勇于承担文化传承的主人翁角色,认清时代发展的趋势与变化,在新媒体语境下探索年轻人的文化领域,创造并传播更强适应性、更为积极向上、更具生命力的民族记忆。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

### 1. 生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作品

20世纪留下了大量关于彝族的珍贵记忆,如90年代的大型纪录片《南方丝绸之路》详尽地记载了多地彝族的风土人情;老电影《阿诗玛》至今仍在当地受到广泛的传播与认可,并深深地嵌入到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之中<sup>[19]</sup>。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摄制了《彝族人的家支》《彝族人的毕摩》等专题纪录片。

《2019年中国网络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纪录片正进入“网生时代”<sup>[20]</sup>,互联网带来受众年龄和门槛前所未有的下降,新媒体纪录片成本低、轻量化、本土化、垂直化,允许专业技术和昂贵设备的缺席。通过微纪录片创作,彝族文化可以找到更为互惠共赢、更为多元化和可持续的内容产品生产模式,缓解地方性知识流散化的问题。

除认知度较高的春晚彝族舞蹈节目、彝族明星歌手外,彝族文化还可以积极探索更为新颖、更为



困境,因为困境本身也潜藏着创造与再生的可能性:彝族青年可以转变自己在传承记忆中扮演的角色,从被动消极的遗忘者变为主动积极的传承者,努力

拥抱以智能手机为象征的新技术与新媒体,重拾文化自信、激发文化自觉,化危为机,让彝族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再度焕发活力与魅力。

#### 参考文献:

-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9.
- [2]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0.
- [3] 江凌,严雯嘉.以文化展演践行少数民族青年文化自觉——以凉山“悬崖村”彝族青年手机直播及短视频为例[J].传媒,2020(1):55.
- [4] 周海燕.政治的记忆[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南京,2013:87.
- [5] BAER A. Consuming history and memory through mass media products[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01(4):491.
- [6] 赵将,翟光勇.文化集体记忆载体与变迁:自一个节庆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17(2):103.
- [7] 张健,李静梅.社会变迁视阈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基于昙华乡松子园村的田野考察[J].民族论坛,2013(10):31.
- [8] 周敏.语言接触背景下的彝族青少年语言生活——以鹤庆县草海中学为个案[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9(9):38.
- [9] 王佳.传统民族歌舞的现代走向[D].昆明:云南大学,2011:115.
- [10] 黄龙光.民间仪式、艺术展演与民俗传承[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4.
- [11] 孙艳泽.论央视春晚少数民族节目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D].沈阳:辽宁大学,2018:3.
- [12] 段宇馨,孔紫晨.从彝族文化视角认识彝族民歌——以广西那坡达腊屯白彝为例[J].当代音乐,2020(5):127.
- [13] Van Dijk J.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33.
- [14]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38.
- [15] 普丽春,肖李.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教育传承现状调查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6,27(4):137.
- [16] 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98.
- [17] 杨柳.短视频平台在草根网红形成过程中的助推效应探析——以抖音为例[J].视听,2020(6):146.
- [1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3.
- [19] 牛静.影像记忆、身份表述与文化认同[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8:55.
- [20] 韩飞.中国纪录片进入“网生时代”——2019年中国网络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传媒,2020(8):38.
- [21]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

(上接第18页)

- [4] 鲁娟.哑奴[EB/OL].(2006-04-05).<http://www.yizuren.com/literature/sg/25171.html>.
- [5] 发星.“大凉山彝族女性诗歌的崛起”系列(一):评彝族女性“现实审黑”写作[EB/OL].(2019-03-06).[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02236577&ver=2634&signature=1f-CBfPJ3PyyrKjL\\*fjpAZkRD8V9UCm7CHvbYIYWY0cOByvOGSuZrk-Ux6n0GQbz44Dpubsow3KYSpt2O2pxiWz\\*fc4aQis-hg74PRWKL5X6MXIh1IP0zbthd9fBnBK&new=1](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02236577&ver=2634&signature=1f-CBfPJ3PyyrKjL*fjpAZkRD8V9UCm7CHvbYIYWY0cOByvOGSuZrk-Ux6n0GQbz44Dpubsow3KYSpt2O2pxiWz*fc4aQis-hg74PRWKL5X6MXIh1IP0zbthd9fBnBK&new=1)
- [6] 潘五呷木.女性意识的多重内蕴——鲁娟《五月的蓝》解读[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3(4).